

广州起义的历史地位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蒋建农

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之际，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标志的第一轮反击。广州起义是这三大起义中最后一个爆发的，也是这些武装起义的最高峰，在中国革命由危机实现向土地革命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广州起义爆发于 1927 年 12 月 11 日，持续三天，活动区域是广州城区和近郊，这是对广州起义时限和活动区域狭义的界定。广州起义的筹备可以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前后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广州起义发动时间的上限应该向前追溯。如果追溯到“四一五”事变前后广东革命军民的反抗运动，似乎有些牵强，但肯定可以追溯到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委会改组后，确定组织南昌起义和湘鄂赣秋收起义之时。与此相关，鉴于筹备广州起义第一阶段广东各地的革命斗争主要以迎接和配合南昌起义军为目的，对广州起义只起到预热和铺垫作用，我们倾向把第二阶段（1927 年 10 月底）以海陆丰为代表的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及其活动范围，作为广州起义波及的区域。因为这一阶段的农民斗争是为广州起义而发动的，并且给予广州城内的暴动以直接的配合。当时的中央文件对此就讲得十分明确，所谓“海陆丰的暴动不过是广东总暴动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倾向于把 7 月中旬作为广州起义开始酝酿的起点，把 10 月底直至 12 月 11 日广州起义正式爆发期间广东省各地暴动烽火及作为广州起义的活动区域。这是我们对于广州起义开始的时间和活动区域的广义界定。广义的界定是根据客观历史事实内在联系的角度设定的，不仅可以拓展研究广州起义的时间长度和区域范围，更重要的有助于深化对广州起义的总体性认识。

第一，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是中共在革命的危急和转变关头，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步骤。“四一二”事变以来，发生在各地的一系列的反革命政变，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陷于失败，使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赢得解放和自由的希望再度被黑暗所笼罩。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崛起，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切合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最大程度地动员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抓住了中国革命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而是唯一正确的总方针。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湘鄂赣的秋收起义不仅是贯彻这一总方针的标志性举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华和南方的辽阔大地上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派的反动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广泛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使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工农兵苏维埃的旗帜深入人心。如果没有这三大起义，就没有后来井冈山、中央苏区、海陆丰、琼崖、左右江、湘鄂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第二，三大起义是一个整体，广州起义居于核心地位。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首先在南昌领导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南昌起义是以回师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据有出海口，以获取苏联的援助，然后再度北伐，从而重新振举为进军线路图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中共中央在湘鄂赣粤

四省发动秋收暴动计划的一部分，并且是与南昌起义夺取广州的计划连为一体的，这在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信中写得很明确：“中央已加督促促两湖暴动的实现。湘鄂暴动的实现，一方面即是对广东的声援”；广州起义有过迎接南昌起义军南下攻占广州和发动广东全省暴动占领广州两个阶段的变化，但是通过暴动夺取广州，建立共产党绝对领导并号召全国的工农民主政权，则是前后一致的。因此，三大起义不仅在时间上是前后相继，而且就其终极目标看，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可以说是广州起义的铺垫，广州起义则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最高峰。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实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总方针的通盘方案。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广东两湖三省的农民暴动都起来了，全国即可改变一个形势，进到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第三，广州起义汲取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新的实践与新的创造。这主要是：其一，第一次公开以共产党的旗帜相号召。南昌起义是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进行起义的发动；秋收起义虽然在酝酿过程中毛泽东就一再要求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但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工农的民主政权”，并积极严厉地指出：“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因此，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在起义发动之初，按照中央的指示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是在是否打出共产党旗帜问题上只好遵守中央的指令。而广州起义在重新启动后就一直是公开以共产党的旗帜进行号召发动的。与此相关，关于起义军的旗号，南昌起义是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秋收起义使用“工农革命军”，广州起义则干脆使用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其二，广州起义第一次将土地革命付诸实践。南昌起义的政纲规定没收 200 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其结果为未能起到动员广大农民参加的实际作用；秋收起义前，虽然毛泽东制定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可惜因辗转征战，这一政策一直到在井冈山扎下根之后才逐步付诸实践。而广州起义在酝酿的过程中，土地革命已经付诸实践。11 月初海陆丰农民再度暴动后，立即开展了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战斗。而且“不仅仅是大中地主加以没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没收之后完全分配给原佃农及自耕农”。这就赢得了海陆丰地区农民群众对广州起义的积极支持，并鼓舞和激励了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农民。这也是广州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江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其三，广州起义第一次建立城乡的工农兵苏维埃。通过建立各级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是中共领导工农大众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南昌起义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利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和影响，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宁汉政府，以号令天下。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曾提出过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理想，但他的建议因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和阻止，未能在秋收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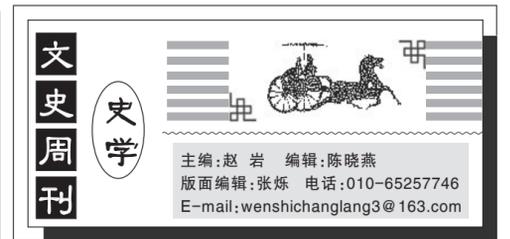
过程中推行。秋收起义拟建立的政权是以“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形式，比如在打下醴陵后建立的就是“革命委员会醴陵分会”。直到井冈山时期第二次打下茶陵后，才于 11 月 27 日建立茶陵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广州起义在酝酿发动期间，就于 11 月 13 日和 18 日分别成立陆丰、海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最早的县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2 月 11 日广州起义爆发后建立广州苏维埃，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城市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这是中国城第一次创建起全新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共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深入土地革命的伟大斗争之初所取得的最重要政治成果。它们把中共的领导、工农群众当家做主（国体）和工农兵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政体）融为一体，不仅为中共和各苏区的政权建设提供了最初的模式和经验，而且奠定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国体与政体的雏形。

第四，广州起义在客观上有益于中共的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和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纠正。勿需讳言，广州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苏联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并遭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但是必须看到，“城市中心论”作为苏联成功的革命经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没有一个人割裂人制度的新型人民政权，当然值得效法和弘扬；中共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发动广州起义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其行动本身英勇可嘉；在武装斗争之初只有苏联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广州起义采用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方式，无可厚非。这和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后，“城市中心论”因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而造成的危害已经日渐显露，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已具雏形，并已取得开辟中央苏区等显著成效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左倾教条错误的推行者们，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是有原则区分的。不仅如此，在客观上讲，广州起义失败后，被迫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余部辗转至海陆丰等地（其中有一小部分汇入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经湘南暴动上井冈山；还有少数人进入左右江地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发展和开辟了海陆丰、琼崖等革命根据地，扩大和丰富了中国革命人探索与实践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区域和内容。与此相关，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共中央直接组织的三大起义中，广州起义是唯一由共产国际直接参与决策，并寄予厚望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牛曼参与筹划广州起义的始终，并在起义时机的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人员参与起义的具体指挥和战斗（一部分在广州的朝鲜和越南的革命者也参加），最终拍板决定发动广州起义的就是斯大林本人。因此，他们对广州起义前后的经过和情形十分了解。中国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在广州起义中的英勇斗争及其被残酷镇压的现实，以及各地相继而起一系列暴动接踵失败的惨痛教训，为正确判断中国革命形势，提供了最直观最具体力的典型，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员和苏联国际在华的代表，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有了比较冷静的认识，有助于纠正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当时推行的左倾盲动错误。共产国际于 1928 年 2 月 4 日明确指示中共中央“绝对禁止进行

没有准备好的过早的发动”，强调“没有广泛的准备、组织和工农之间的联系，暴动注定要失败。”指示传到中共后，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于同年 4 月被纠正。

第五，中共在系统总结广州起义意义与失败教训的过程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其中有些观点对正确认识中国革命问题、选择适应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广州起义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围绕起义失败的因和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反思与总结，一直持续到 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召开，才告一段落。这场讨论涉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主力军和参加者及其对象，中共的组织建设、工人运动新特点，武装暴动的发动区域与方式，革命军队的构成和建设，没收地主土地的范围和分配办法，城乡工农兵苏维埃的组成等等。用后来经过检验被认定为正确的历史结论审视这场讨论中所阐述的各种观点，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还有正确与错误参半的，其中不乏能够丰富或深化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认识的思想火花，加深了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正是基于上述的思辨过程，1928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既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内弥漫的右倾投降错误，又批判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盛行的左倾盲动错误，正确地断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基本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并制定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十大革命纲领”。从而统一了全党思想，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苏维埃运动的全面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广州起义失败后围绕广州起义意义与教训的大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大革命失败后的转折时期，中共独立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近半年来，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革命实践的全面总结和反思，是对新的革命形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革命道路的深入思考。这是广州起义留给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和历史贡献。

对于广州起义后一直纠缠不清的中国革命究竟是处于高潮还是低潮时期的问题，也是在经过对广州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入反思之后，最终由斯大林做出权威的判断：“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却之证明”。他说“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潮了”，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由南昌起义为开端的中共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第一波高潮，到广州起义失败为标志宣告结束。正如毛泽东在 1932 年 12 月 2 日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 36 号命令中所指出：“广州暴动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新阶段”，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以深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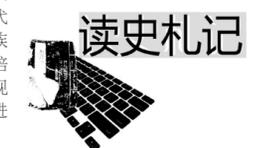
主编：赵岩 编辑：陈晓燕
版面编辑：张烁 电话：010-65257746
E-mail: wenshichanglang3@163.com

冯梦龙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曾在福建寿宁任知县，政绩昭然，久为世人所传颂。冯氏任内曾多次微服察访，体察民本，对寿宁风俗民情处处留意，深入调查研究，搜集了不少轶事逸闻，积累资料，涉笔记录在案，写成了“以待其人”“以待其时”的地方志书《寿宁待志》。其内容除记载他在寿宁的政事活动和对社会的思考以及寿宁县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与风土人情外，还以大量篇幅记录他宦游寿宁时的施政设想和治理。根据寿宁“岭峻溪深、民贫俗俭”的特点，冯梦龙提出“除寇、宽赋、省赋”的政治主张，并主张恩威并重。他早在《喻世明言》中，就推崇沈谦做了三任好县官，当他自己成为县令后，他小说中塑造的清官就成了他施政的楷模，他察破姜廷盛诬告一案以及智擒恶霸陈伯进一事，大有包、况之遗风，真可谓人如其文。

冯氏是个颇有理想和才干的贤明地方官。在任四年，为官清廉，他“政简刑清，好整以暇”，处处以清官律己。《待志》保存了不少有关冯梦龙生平经历的珍贵资料，记述了他在执政中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同时期记事抒怀的诗作和极富特色的文告等。因此，它既是饶有地方色彩的书，又是冯氏在任四年政治实践的总结。由此可见，冯梦龙是一个文人与官宦相结合的人物，施政中不乏其严厉浪漫相结合的色彩。这部别具一格的《待志》，采用第一人称呼法，借志立传，是古今县志所未有的。志中材料除根据官方文书和参考“旧志”外，大部分是他的亲身经历和亲自调查得来的，其评述论断，乃是他本人意见。因此，《待志》是一家之言的“私书”，是一部珍贵罕见的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私家志书。纵观全书，言简意赅，开宗明义、据事直书、无所忌讳、下笔不苟，流露出冯梦龙严肃认真的史学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治学大有考据家风度。该书对研究明末历史和福建地方史以及冯氏学术思想，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这部淹没 300 多年的《寿宁待志》，1983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后，在我国史学界、学术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它曾作为我省的一部优秀出版物，参加 1984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图书展览。香港“三联通讯”称之为“一件出版界的大事”。从此，文化界掀起了“冯梦龙研究热”。

1985 年 10 月，全国首次《冯梦龙学术讨论会》在寿宁和宁德两地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的百余名文史专家学者参加；此后，江苏苏州、福建寿宁等多地相继开展“冯学”研究交流活动；2014 年 11 月，有北京、天津、江苏的“冯学”学者 80 余人聚集寿宁举办《冯梦龙文化高峰论坛》，隆重纪念历史名人，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2016 年 11 月 26 日，在福建江夏学院举办的 2016 冯梦龙文化研究会，是近年来面向全国冯梦龙研究成果最大的一次盛会，来自各地学者撰写的 42 篇近 30 万字的学术论文，从通俗文艺、廉政文化、法制文化三个方面集中展示、阐述、挖掘、传承冯氏“为文”“为官”“为人”的当代价值，使冯梦龙文化这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笔者的家乡，“蜀道”贯穿其间，又是“三国”时期的战略要冲，所以尽管毫无研究，却随着年岁增长，对那诗人唱叹称“难”的“蜀道”，“浪花淘尽”却“英豪辈出”的“三国”，格外关注起来。近日，得到对此两课题有深入研究者孙启祥先生的《蜀道三国史研究》一书（巴蜀书社 2017 年 6 月 1 版），使我不仅对此两课题有了广泛深入了解，同时还得到更多知识之外的有益收获。

今人，尤其学界的所谓“蜀道”，是一个较为久远的概念。用本书作者费心梳理后的说法：“日久天长，‘蜀道’一词也逐渐成为从汉唐首都通往汉中、成都的道路的专称。”（六页）相对而言，包含有社会、军事、人物等多个层面的“三国”时期，概念相对清晰一些。可无论由于漫长岁月中不断迁徙，纷繁却漫漶的“蜀道”，还是“三国”时期一代风流人物的精彩表演，通过本书作者之笔，笔者均获得由史料充分占有、理性清明分析、语言确当谨慎，以及由此产生，值得信赖的非常认知。

“蜀道”，虽然作者概括为“从汉唐首都通往汉中、成都的道路的专称。”可实际看去，道路多条，线路变化，毁损修建，地域归属，甚至名称演变等等，均由于时间久远，厘清起来，相当困难。这不仅是对普通读者而言，就算专事此方面研究的学人，史料的掌握，剖析的能力，甚至堪舆的实际辨析判断，都影响着结论的可靠程度。从该书看去，作者在此方面下了极大功夫。他不但对其其中譬如“褒斜道”“连云栈道”“故道”“金牛道”等重要道路的名称、形成以及变化进行了详尽研究，还以开篇《蜀道概说》和终篇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蜀道历史文化研究》两文，对整个“蜀道”的种种情形，进行了全面梳理，不仅表现了作者的研究深度，也凸显了作者涉猎的宽阔幅度。

由“蜀道”而“三国”，一道路迁变，一历史时期，在其他地区研究者，或者略觉差异，可对于生活在这个发生过许多“三国”故事，同时又居于“蜀道”区间的作者，一切十分自然。这样的研究，正是作者对故乡地理历史珍惜心情的显现。《蜀道上的三国风云》是二者直接联系的产物。其中“蜀道与三国历史”“三国争雄与蜀道开辟利

“蜀道”通今古 “三国”演春秋

——读《蜀道三国史研究》

杨建民

用”以及“各条蜀道的地位和作用”“丰富的文化遗产”各章节，不仅厘清了其中的相应、必然联系，还将其间文化遗存与今天可运用的历史资源，提纲挈领地予以介绍，使得二者联系研究的现实价值得以呈现。

一路读来，笔者对这部著述中有关三国时期人物、事件的研究大感兴味。由于专业所限，笔者对此认识，还多陷在《三国演义》“妙笔生花”的情节之中，故此常常希望了解可靠的历史事实，来为自己解“蔽”。这部著述中的多个章节，正是我关注的要点。譬如诸葛亮，这个千百年来为大众敬仰的“人物”，已经不仅道德完美，且智慧超群，几乎“完人”。可笔者知道，这样的“完美”，作为“人”，几乎不可能。作者对此“人物”，似乎也有兴趣，本书中，他以诸葛亮为题的文章就有三篇之多：《史书中的诸葛亮和演义中的孔明》《诸葛亮与“空城计”》《诸葛亮“武乡侯”、张飞“西乡侯”是县侯吗》。第一篇文章不长，但结实。首先，作者分析了诸葛亮得享盛名的客观因素。在前期刊刘各集团，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有庞统及法正。可惜他们的早逝，“未尽全才”，因而英名不及诸葛亮。类比曹魏、东吴集团，与诸葛亮互为伯仲者不少：荀彧、郭嘉，鲁肃……荀彧或曹魏誉为张良，将郭嘉引为相如。两人辅佐曹操平定统一北方，功业比之“诸葛亮的南征北伐毫无逊色。”那位在“演义”中被画成愚钝长者的鲁肃，史书称其“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本书作者以为“而论其远见和谦净，似还居诸葛亮之上。”（二五七页）这几个人物，就在《三国演义》中也不掩其亮色；此文在对诸葛亮治国安邦五个方

面建树介绍之余，还对其辅国治吏和处世立身的杰出才能和优秀品质加以肯定，但是，从历史真实和求实态度出发，此文也引述史书，指出其“奇谋为短”，故五次北伐事倍功半；且“他不喜欢刚刚立一个……他容人待士明显逊于刘备，故许多旧臣在后期未能施展才智。”通过史书，作者进一步指出：“《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诸葛亮明的许多过人之处都与世无争。他参与了赤壁之战，但未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七星坛祭风；遇事先伏‘锦囊妙计’、气死周瑜、骂死王朗、西城弄险、陇上装神、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或为其不能为，或为其不愿为，皆属演义的美化、渲染、夸张、虚构之笔。”读到这里，我对这个人物认识，才算透彻到位了。

尽管有“演义”的形象可供作美学享受，可它绝不能进历史真实的认知。这应该是常识。对于缺乏史学根底的普通读者，由此短文，可以建立一个“演义”及“实际”的区别概念。不仅诸葛亮，一切事件人物，都应该有这样的清醒理解，才不会盲从。“全信”或“全疑”，虽然我们可以不动脑子，但却使我们离真理更远。

诸葛亮之外，曹操也是一个“演义”形象与历史真相大有别处的人物。笔者认真阅读了该书《古今人眼里的曹操》也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塑造》两文。从中不仅得到对真实曹操的认知，还动摇了先前的一些思考形象。无论怎么说，《三国演义》对曹操（艺术）形象在大众中的传播，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写文章，笔者曾经阅读了鲁迅、郭沫若等有名学人对曹操的看法。这很有利于剥落“演义”中获得的“奸臣”遇事。这

种观念，笔者一直很是信服。此次读这部著述，笔者才算真正，全面地认识了曹操，对曹操功过的判断，才算回到了一个立得住脚跟的基点。

在《古今人眼里的曹操》一文开首，作者定性：“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集奸臣与英雄于一体的一个人物，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也是奸伪暴虐、阴险狡诈、统一北方、戒奢尚俭、立学兴教”这些非英雄所能为壮举，“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二二二页）同时读到“曹操的不忠于君、结党营私、残忍凶暴、多疑诡谲”的奸臣一面。君在说，是作者出入史籍的执梳，以及清明的识见，给了我们认识这个历史大人物的重要启发。

在此文中，针对近些年来人们对曹操评价的偏颇，作者专门辟出“今人的功利性和情绪化”一节，于此有发人深省地剖析：“观察分析近代以来对曹操淡化恶劣行径、否定奸臣危害的评价，除了学术见解、曲意迎合、政治‘炒作’等因素，还与我们的崇尚强权的政治生态和喜欢标新立异的文化风气有直接关系。”具体而言：“中外都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有崇尚强权、歌颂暴力特点……因此，我们歌颂的帝王，大多是暴烈的、富有侵略性的，对读书人残忍的，如秦始皇、汉武帝、忽必烈、明成祖、清圣祖、清高宗之类；而那些守成的、对普通民众体恤、对读书人宽容的君主，如隋文

帝、唐高宗、南唐李煜、宋代诸帝、清光绪帝等，反而受到知识分子的轻视甚至嘲讽。”（二二六页）这一节分析，十分确当。它可以说扼住了我们文化认知中一个误区的软肋。有了作者这样立意的启发，对曹操的功过，我们才算有了一个照应历史演进，同时合乎人性发展，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可靠判断。请站在一个正常、普通人的角度理性思考，我们应该对这些帝王如何论说？中国古人对治史者有“三长”之说：史才，史学，史识。笔者以为，“史识”不仅是理性认知判断，还有情感参入。也就是说论断之中，还应有作者感同身受的悲悯情怀。这节分析论述，相当充分显现了本书作者思虑辩证清晰，且富有“人道”情怀的清明“史识”。

基于以上介绍的种种，笔者可以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部《蜀道三国史研究》。这部著述，虽然是作者对珍爱家乡角度出发的文字，可在选材上，却注意到更广泛读者的兴味；作者的文字，十分严谨却质朴，展现了一个史学者深厚的功力；作者掌握运用材料，可以从几篇综述文章以及“主要参考文献”见出；至于“史识”，从笔者略加引述的章节，可见其从“人道”出发的基点、立意，以及申说、辩证的逻辑力量。无论研究者或并不专研“蜀道”“三国”的普通读者，打开这部书，你都会为其中清明、公允的理性风度吸引，受到作者对家乡珍惜情怀的濡染。一部历史研究著述，有这两方面的切实保证，“开卷有益”就不会是一句空泛之言。

